

日本的全球安全发展问题探析*

刘云 田正

内容提要：国际形势持续复杂多变，日本随美起舞，试图重建“战略不可或缺性”的产业性权力，建构物资“战略自主性”稳定供应的资源性权力，以及影响乃至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性权力。上述做法与当前日本的三个战略偏好息息相关：“大国化”是政治夙愿，保守主义是思考方式，自由开放是现实需求。日本过度依赖保守思维、偏好“小安全”、强调“战略自主性”，只会越强调安全越不安全，越“脱钩断链”越没有发展，陷入发展的“布雷斯悖论”。东升西降与亚洲世纪是历史性大趋势，日本真正实现安全发展离不开亚洲与东方，更离不开中国。

关键词：日本 | 全球安全发展 | 产业性权力 | 资源性权力 | 规则性权力

作者介绍：刘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时事出版社副社长，主要研究日本经济、全球化等；田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中日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日本经济。

日本的安全发展高度依赖全球化。近年来，面对美国霸权震荡下行引发的世界动荡，日本意图依托比较优势构建安全发展的产业性权力、资源性权力、规则性权力这三大权力，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大国化”、保守主义和自由开放三个偏好。日本身处亚洲与东方，强化日美同盟的做法并不会给其带来安全发展，主动顺应历史潮流则是其安全发展的保障。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20VGQ004、21BGJ057）的阶段性成果。

战略目标：获取三大权力

国际形势持续复杂多变，日本视经济为保障安全发展的权力手段。围绕全球产业性权力、资源性权力和规则性权力，日本随美起舞，试图逆转国力下滑，力保发展更“安全”。

（一）重建“战略不可或缺性”的产业性权力

产业性权力是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战后日本的发展受益于产业性权力，但近年优势逐渐丧失。为重建产业性权力，首相岸田文雄将经济安全保障作为增长支柱，强调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严控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要素和环节。其目的是建立日本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战略不可或缺性”，保持和培育核心竞争力，寻找和打磨新的不可或缺领域，增加他国对本国“不对称依赖”或“结构性依赖”，并把优势作为“主动性攻击武器”，确保国家长期安全、稳定与繁荣。^①

1. 产业性权力的基础是自身技术优势

日本要在中美之间保持“自立地位”，重要手段是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不可或缺技术的保护开发。2022年度，日本投入104.9亿日元支援增长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投入18.5亿日元完善重要技术管理体制，防止关键技术流失；计划2023年度再投入132.9亿日元和17亿日元分别用于上述方向。其中，涉及新材料、精密加工、立体造型、表面处理、机器控制等12个技术领域，以及全球技术动向调查和出口与投资的技术管理。^②

① 小林鷹之、「日本経済のメインプレーヤーは民間企業であり、アカデミア。危機感を共有して経済安全保障を考えていく」、『財界』、2022年1月12日号、第67頁；自民党、「経済安全保障対策本部中間とりまとめ」、<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3658.html>。

② 中小企業庁、「令和3年度補正・令和4年度当初中小企業・小規模事業者関係予算案等のポイント」、https://www.chusho.meti.go.jp/koukai/yosan/2021/1224/001_point.pdf；経済産業省、「重要技術管理体制強化事業」、https://www.meti.go.jp/main/yosan/yosan_fy2022/pr/ip/keikyo_08.pdf；経済産業省、「成長型中小企業等研究開発支援事業」、<https://www.kanto.meti.go.jp/seisaku/sapoin/>。

2. 当前产业性权力的关键是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产业外部经济性很高，可提升一国整体经济水平，且随社会数字化程度加深而更趋重要。20世纪80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优势因《日美半导体协定》和“产业政策退坡”而衰落，此后再未跃上世界潮头，表现为国际竞争力不足、人才流失严重。为复活该产业、避免经济再陷“失败境遇”，日本“举全国之力，用‘倒推’方式，以十年为单位设计和制定战略规划”：首先是推动半导体生产回国；然后是借助日美合作确立下一代半导体技术，以及依托长期国际合作研发光电融合技术等。2022年10月，日本设立总额为4500亿日元的尖端半导体生产整備基金落实上述规划。2023年1月，岸田访美，两国共同声明将用“经济版2+2”推动半导体技术合作。随后，日本政府投入700亿日元支持资金，丰田、索尼、日本电气、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等8家企业同步出资735亿日元成立半导体企业急速（Rapidus），计划2027年量产2纳米半导体，用于量子计算、数据中心、自动驾驶、智慧城市等。^①此外，日本政府正在资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开发基于氮化镓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该材料可大幅降低电动汽车、数据中心、手机基站等应用环境电耗，还可降低对硅材料的进口依赖。

3. 产业性权力的核心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全球产业布局

岸田反复谈及强化日美“经济版2+2”合作，构建“自由、公平、开放”的经济秩序，欲借同盟威慑力维持国际社会繁荣。一系列操作的实质是构建同盟主导的全球产业布局，降低对华依赖。例如，积极引导半导体、零部件、工业原料等行业日企向东盟投资，鼓励在华日企向东盟转移。2022年，日本政府两轮“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支援”就资助了17家日企，显露其控制海外产业布局的手段。具体包括：借助驻外使领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海外分支等的政策引导和服务实现掌控；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软对接；通过并购高科技企业提升竞争力等。

^① 日本经济新闻、「半導体新会社、午後発表へ 経産相が700億円助成表明」、<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0DWH0Q2A111C2000000/>。

（二）建构物资“战略自主性”稳定供应的资源性权力

日本 99.7% 的石油、近 100% 稀有金属、按热量计 62% 的粮食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运转依赖全球配置。^① 受美国“脱钩断链”政策及乌克兰危机影响，日本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凸显。原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认为，“不可或缺物资过度依赖他国是危险的”，这一认知是当前日本政界共识。于日本而言，资源性权力是指战略物资供应链自主可控，强调“战略自主性”或“经济自律性”。日本正通过储备、寻找替代、强化供给能力、增强与盟国合作等多种方式克服自身缺陷，降低对他国的“不对称依赖”或“结构性依赖”，特别是不依靠具威胁性的国家供应国计民生物资。同时，2022 年出台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明确将天然气、金属矿物、抗生素、肥料、永久磁铁等纳入战略物资范围。同年，日本政府第二次补充预算中有 1.35 万亿日元与战略物资供应有关。^② 其建构资源性权力的方向如下。

一是推动资源外交。将石油等资源稳定供应作为外交工作目标，强化情报搜集、双边合作和国际发声。2022 年 10 月，岸田访问澳大利亚，签署了确保稀有金属镍、钴、锂和稀土稳定供应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矿山开发、矿石精炼等。2023 年 1 月，岸田访问加拿大，探讨了如何扩大关键矿产、能源、农业、食品等领域的合作。此外，日本还与阿根廷、菲律宾、刚果（金）等加强了资源领域的外交沟通，如与刚果（金）联合声明将保证钴长期供应。

二是增加战略物资储备。高效率、低损耗、零库存的战略物资储备方式已成过去时。为防产业链供应链中断，日本政府鼓励构建“以防万一”（Just-In-Case）的进口与储备机制。例如，能源方面，2022 年创设“战略性剩余天然气制度”，紧急情况时仅供国内企业使用。粮食方面，鼓励化肥原料存储设施建设，计划 2027 年实现满足国内 3 个月农业生产需求的储备。药品方面，

① 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の今を知る 10 の質問」、<https://www.enecho.meti.go.jp/about/pamphlet/energy2021/001/>；農林水産省、「食料自給率のお話」、https://www.maff.go.jp/j/zyukyu/zikyu_ritu/ohanasi01.html。

② 財務省、「令和 4 年度補正予算（第 2 号）の概要」、https://www.mof.go.jp/policy/budget/budger_workflow/budget/fy2022/20221108033406.html。

2023年1月颁布《抗生素安全稳定供应方案》，要求提升内酰胺类抗生素等药品的原料和原料药的储备能力，设特定基金为企业提供支持。稀有金属方面，增加海外采购和矿权储备，由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提供储量评估、融资担保等全方位支持。

三是提升重要物资国内生产能力。日本政府提出，经济财政运营要以确保矿物、药品等重要物资供应为改革目标，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并称此举既可降低对他国的“不对称依赖”，还可提升本土技术水平和增加居民就业与收入。能源方面，推动核电重启、可再生能源灵活运用，提高能源自给率。粮食方面，鼓励国内增产饲料、小麦、淀粉、木材等，推动原料国产化替代。2022年第二次补充预算中，分别补贴110亿日元和100亿日元扩大国内饲料和农作物生产。^①稀有金属方面，鼓励在国内建厂降低依赖。以80%依赖中国进口的氢氧化锂为例，日本国内第一家氢氧化锂工厂2022年11月在福岛县桧叶町竣工。该厂由丰田通商与澳大利亚锂矿商奥罗科布雷合资，以丰田通商拥有权益的阿根廷碳酸锂矿所产的碳酸锂为原料，年产能1万吨，可满足15万至20万辆电动汽车生产需求。^②

（三）建构影响乃至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性权力

规则性权力依托于产业性权力与资源性权力，被日本视为货币与财政政策外的第三种经济手段以及由经济硬实力与外交软实力共同构建的巧实力。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强化经济“阵营化”，推进基于规则的贸易协定，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与区域治理将自身“理想”纳入国际规则制定之中，意图构建更符合日本价值观的“公平、公正、安全、自由、无差别”的国际经济环境。具体做法如，加强政府主导的政企合作，设立数字贸易、绿色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专业工作组。原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原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等前政

① 財務省、「令和4年度補正予算（第2号）の概要」、https://www.mof.go.jp/policy/budget/budger_workflow/budget/fy2022/20221108033406.html。

② 豊田通商株式会社、「国内初、水酸化リチウムの製造工場が福島県檜葉町に竣工」、https://www.toyota-tsusho.com/press/detail/221116_006132.html。

府官员评价称，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秩序动摇之际，规则性权力与安全发展的关系愈加紧密、作用愈加凸显，日美主导“共同价值观”国家完善标准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①

一是主张“可信赖的数据自由流通”（DFFT）数字贸易规则。DFFT由原首相安倍晋三2019年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后成为G20大阪峰会重要倡议。2022年6月，岸田在G7峰会上提出构建DFFT体系，即提升跨境规则联通性以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意图主导全球数据流通规则制定。具体措施包括：推动2022年G7数字部长会议制定《DFFT行动方案》，建议完善法规程序、构建可操作性框架等；将DFFT设为2023年G7广岛峰会重要议题，建议新设由各国数字部门、大学、企业等组成的国际组织负责落地；推动以DFFT为基础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数字贸易谈判，构建坚韧安全的信息平台和基础设施，实现可靠安全的跨境数据流通。

二是提出绿色转型，主张绿色产业规则。日本较早实现了“三绿”产业体系（绿色制造、绿色回收、绿色能源），这成为岸田用“绿色”获取经济实利、引领国际规则的重要抓手。为此，日本政府设立了“绿色转型实行会议”“绿色转型企业联盟”等，广纳社会意见，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23年1月，共有679家日企加入联盟。^②2023年1月，岸田提出“亚洲脱碳共同体”，要把日本的绿色产业技术、制度和经验推向亚洲，意图推广能让日本获利的碳中和路线。当年2月，日本颁布《绿色转型实现基本方针——十年路线图》，强调通过规则制定扩大国内外绿色市场，包括节能产品标准、绿色制钢评价、绿色塑料生产流程等，形成绿色产业规模效应，提升国际竞争力。例如，国土交通省出资350亿日元与日本邮船、川崎汽船等联合开发燃料氨和氢能船舶，计

① 北村滋、『经济安全保障』、中央公論社、2022年、第93頁；NRI、「ルール形成経済安全保障」、https://www.nri.com/jp/service/solution/mcs/theme_rule；日経ビジネス、「甘利氏に聞く経済安保と規制企業が対応求められる理由」、<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303NJ0Q3AI30C2000000/>。

② 経済産業省、「GXLeague」、<https://gx-league.go.jp/en/>。

划将项目形成的安全标准和航行标准提交国际海事组织推为国际标准。^①

三是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安倍时期，日本相继推出“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原则”等概念。岸田同样认为，只有掌握全球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权，才能逆转日企竞争力下降趋势，从而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2022年7月，经产大臣萩生田光一在首次日美“经济版2+2”会议上呼吁，遵守日本主张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公认原则，建设社会友好型基础设施。^②同年11月，岸田在G20“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活动上再度表达上述主张，强调规则“公平、透明”。具体策略包括：选择发展空间大、对日企有利的技术，通过官民合作、盟友合作使其成为国际标准。例如，参与后5G技术国际标准制定；分阶段将日本标准推为国际标准，包括在海外推广日本地面数字电视技术、完善售后服务，进而使之变为国际标准；扩大海外基础设施系统建设优势，包括在新兴国家普及日本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在海外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等；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等实现认定，例如先将“日本铁路标准”（STRASYA）认定为国际标准，再推广至亚洲国家。

战略驱动力：突出三个偏好

日本寻求全球安全发展的三大权力，与后安倍时代日本战略偏好息息相关。安倍改变了日本的发展进程，打开了日本的全球视野，引发了日本战略觉醒，^③岸田政权则被称为“没有安倍的安倍政权”，三大战略偏好正是其全球安全发展的战略驱动。

① 日本经济新闻、「CO2ゼロ船、26年実証運航へ 国交省・日本郵船など連携」、<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44D70U2A610C2000000/>。

② 日本经济新闻、「日米経済版2プラス2 共同声明と行動計画の全文」、<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9DH00Z20C22A7000000/>。

③ 观点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陆忠伟。

第一个偏好：“大国化”

“大国化”是战后日本贯穿始终的政治诉求，是安全发展的核心目标。它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第二层是不断增强国家的战略性，成为强有力的全球大国。

“正常化”依赖于包括经济在内的国家“自立”。安倍主张并践行“脱战后体制”，调整“吉田路线”，展开“俯瞰地球仪外交”。岸田继承了“安倍体制”，认为日本站在历史性分歧点上，面对国际权力平衡显著变化，“协调与中断、合作与对立”复杂交错，首要课题是实现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自立”。由此，岸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建立在安倍愿景之上，涵盖经济安全保障，被视作一场“超越战后和平宪法框架的国内政治革命”。^①

经济权力是“大国化”重要支撑。原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称，日本“作为一个大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和塑造（经济）权力，这是因为在国际舞台中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经济）权力……需要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以自身为出发点，确保日本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②为实现“大国化”，安倍明确提出“着眼未来发展”，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培育经济权力，确保日本是世界第二大潜在市场。岸田则在2022年12月修订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備计划》，将“通过经济增长实现进一步繁荣”“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明确为实现“大国化”的经济手段。

经济发展是“大国化”的根基、安全的前提。经济发展的首要是国力最大化，既包括国防能力，还包括经济、财政、能源相结合的能力。谷内正太郎认为，“巩固和提升日本的大国地位，与维持和发展经济力量息息相关……日本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存在感，正是依靠包括科学、技术等在内的经济发展”，并称“若经济发展不利，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也会成比例下

① ウォールド・ストリート・ジャーナル、「『眠れる巨人』日本が目覚める」、<https://jp.wsj.com/articles/the-sleeping-japanese-giant-awakes-11671422888>。

② 谷内正太郎、「日本外交の志を立てるとき」、「voice」、2022年4月号、第18-29頁。

降……要确保经济总量维持在世界前五名之内”。^①同样，原《朝日新闻》总编船桥洋一提出，“必须先进行经济‘治理创新’，才能切实加强国家实力和国防能力”。^②岸田“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岸田认为，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第三次历史性转变，不仅涉及“市场与国家”“官方与民间”的简单划分，还包括“市场无法解决、具有巨大外部性的社会性问题”；“新资本主义”强调国家对市场的作用，旨在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与权力，使日本在国家竞争中胜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利用经济权力主动进攻；科学技术的研发、应用实践和市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创新都极为重要。为此，岸田计划通过《资产所得倍增计划》在5年内实现初创企业投资增加10倍。

第二个偏好：保守主义

“保守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日本人的一种思考方式”，更是自民党思考国家发展的政治底色。^③因经济长期低迷，日本社会弥漫着国家没落与丧失地位的焦虑，由吉田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创建的重视经济发展的“保守本流”式微，陷入安于现状的“没有思想的保守”的状态。面对百年变局，安倍尝试重塑“日本的保守价值”，具体表现为“进攻型的保守主义”“开放的保守主义”“改革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保守但不失灵活。岸田自诩安倍保守主义“正统继承者”，在包括经济在内的全球问题上比安倍更保守和右倾。据《朝日新闻》调查，相较2019年，2022年的日本参议院在外交、安全和经济方面更趋保守，更倾向于“大政府”。^④2023年1月，岸田提出事关日本国运的“两个77年”（第一个77年是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第二个是二战结束到当前）历史转折点，要抛弃“前时代”常识，以强大觉悟展望未来，构筑符合新时代的

① 谷内正太郎、「日本外交の志を立てるとき」、『voice』、2022年4月号、第18-29頁。

② 日本経済新聞、「第2回防衛力強化の有識者会議 出席者の発言全文」、<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253GK0V20C25A1000000/>。

③ 細谷雄一、「宰相安倍晋三論」、『中央公論』、2022年9月号、第49-55頁。

④ 朝日新聞、「朝日・東大谷口研究室共同調査）参院新勢力、読み解くと」、<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5352999.html>。

社会、经济和国际秩序。这一观点被日本舆论解读为“保守主义向战前回归”，“日本正进入‘新战前’状态”，“要像豪猪一样，积极准备预防攻击”。^①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全球发展问题上日趋重视“小安全”。伴随着日本社会中低收入群体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受老龄化冲击能否维持也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更看重眼前利益，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随之而来，反映在国家政策上就是强调“价值观”“阵营化”“友岸外包”的“小安全”。岸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源自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但比安倍“积极和平主义”走得更远，有滑向“极端保守”的趋势。“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围绕日本的发展权力展开，欲借“小安全”在全球性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主导这些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具体包括：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强化同盟的威慑力和处理能力，推进同盟主导下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进一步突出美西方“价值观”，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全民健康覆盖等全球性议题；借口守护国民生命与生活，增强防卫能力。著名学者中西辉政认为，这一做法能够宣扬日本坚守的独特的“保守价值”。^②

另一方面，鼓噪经济发展的安全逻辑。后安倍时代，日本在保守右翼鼓吹下日益重视经济安全保障。《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落地，意味着日本在国家层面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按照经济安全重要推手之一的高市早苗所述，日本应在经济安全领域做到“在各种情况下，均能确保国内必要物资供应；防止国内敏感技术、先进技术、战略物资等外流；防止国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受网络攻击”。^③岸田政府依据保守视角进行经济制度安排，将产业自主性凌驾于经济规律之上，将技术保护与国家利益挂钩，要求企业“从国家利益角度与政府就什么是威胁达成共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划定14个需接受政府审查的重要领域，强化专利审查、引入专利非公开制度，以确保日本在某些技术

① 中北孝爾、宇野重規、「野党再生に足りないイデオロギイと強さ」、『中央公論』、2022年10月、第18-29頁；朝日新聞、「『新しい戦前』になるのか、危うい岸田流リアリズム 佐藤徳仁」、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5561210.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

② 中西輝政、「新しい現実主義で習近平と対峙せよ」、『voice』、2022年3月号、第38-48頁。

③ 高市早苗、「激化する国際情勢と我が国の経済安全保障」、『新国策』、2022年12月号、第4-13頁。

领域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并让他国认识到“没有日本就无法接触和获取这些高级技术”。

第三个偏好：自由开放

自由开放是战后日本基于比较优势与劣势形成的重要价值观。日本是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实际受益者，自身发展离不开全球开放，常自诩为“自由贸易旗手”。自由开放最主要体现在日本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战略上，其内核是“重商主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理主义”，旨在确保发展优势。目前，日本经济合作协议（EPA）已覆盖贸易总额的80%，涉及78个国家和地区。^①针对当前国际形势，经济产业省通商战略室室长田村英康等认为，世界正走向“权力统治而非规则统治”局面，但是推动自由贸易依然重要，日本需与西方国家、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构建基于规则的新国际秩序。^②岸田“新资本主义”也明确提出，始终将贸易立国和投资立国作为基本国策，依托全球化，通过促进人财物、数据等生产要素资源自由流通实现发展。具体做法上，称日本应继续扩大EPA覆盖范围，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环境；不仅成为自由贸易支持者，还要成为国际规则塑成者。

自由开放也是日本破解发展潜力不足的最优路径。日本资源匮乏、人口结构恶化、市场规模狭小，本土经济潜能有限，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市场。截至2022年8月，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3625.6万，75岁以上老年人1925.3万，总人口占比分别为29.0%和15.4%；0—14岁儿童仅1456.3万，占比11.6%；15—64岁劳动人口7426.3万，占比59.4%，较2021年下降0.5%。^③人口结构持续恶化，将导致内需不足、投资乏力、人力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下降、财政

①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経済秩序の再構築に向けて」、<https://www.keidanren.or.jp/policy/2022/081.html>。

② 田村英康、「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新たな経済連携のあり方」、『日本貿易会月報』、2022年7-8月、第12-13頁；日本経済新聞、「戦中に生まれる戦後秩序 日本、太平洋憲章の起草を」、<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CD270FY0X20C23A1000000/>。

③ 厚生労働省、「我が国の人口について」、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21481.html；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https://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2301.pdf>。

负担高企等；反映在宏观数据上，就是潜在增长率只有 0.31%，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 10 年前 0.42% 降至当前的 0.02%。^① 近年，日本贸易依存度约为 30.9%，将近 30 年前的 2 倍。尽管政府有意促进产业回流、加强科技创新，但只依靠国内市场很难逆转国力下行趋势；而过于追求本土生产反而会影响日本通过自由贸易获利，须慎重把握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经济效率的平衡。^②

“印太”被日本视作实现自由开放的核心区域、国际社会繁荣稳定的关键。岸田继承了安倍“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在 2022 年 6 月“亚洲安全保障会议”上提出“和平的岸田展望”，目标是进一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强化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并将在 2023 年内提出基于和平目的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岸田政府认为，“印太”的核心是亚洲，亚洲的核心是东亚。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以亚洲为中心成功构建了广阔的国际生产网络，并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与高附加值化，获益丰厚。未来，必须进一步扩大这种生产模式，建立与之匹配的规则与指导方针。具体如中日韩在内的东亚是世界三大经济圈之一，全球机械零部件和制成品的重要供应者，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日本对东亚国家的中间品出口占比达 65%，深度嵌入东亚产业链供应链，未来应继续融入和推动东亚生产网络升级。^③

日本全球安全发展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当前的日本过度依赖保守思维、偏好“小安全”、强调“战略自主性”，忽视了安全发展的本质与客观规律，破坏了自身、地区和全球安全发展的基础，最终还要回归以亚洲与东方为依托的真正的自由开放。

- ① 日本銀行、「需給ギャップと潜在成長率」、https://www.boj.or.jp/research/research_data/gap/index.htm；経済産業研究所、「JIPデータベース2021」、<https://www.rieti.go.jp/jp/database/JIP2021/index.html>。
- ② 三菱UFJリサーチ&コンサルティング調査部長中塚伸幸、「経済安全保障と自由貿易のバランスも重要」、https://www.murc.jp/wp-content/uploads/2022/04/38041_02.pdf。
- ③ RIETI-TID2020, <https://www.rieti.go.jp/jp/projects/rieti-tid/>；日本経済新聞、「広域FTAで生産網強化をASEAN統合の未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CD1446Z0U2A310C2000000/>。

（一）阻碍自身良性发展，动摇安全根基

“灭六国者，六国也。”在错误的道路上追求三大权力，只会让发展越来越不安全。一是抬高企业成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对日企特别是中小企业而言是巨大负担，不仅提高了零部件采购成本，增加了新建厂房、新购设备、调整管理、培训新员工等支出，还面临投资“法律制度不完善国家”出现的交易成本上升。若不顾一切将中间品和完成品生产迁回本土，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国民负担加重。据《日本经济新闻》2022年11月调查数据显示，虽然53%的日企欲用本土、泰国、越南等部分采购替代中国采购，但避免不了因物流网络不完善、专业人才不足等增加的生产成本。据估算，工厂撤离中国的费用高达5.08万亿日元，与中国完全“脱钩断链”增加的生产成本高达5.34万亿日元。例如，医疗手套生产商昭和公司虽申请到55亿日元“国内投资促进事业费补助金”，但因本土工厂建设规制严格、工人雇佣难，投资预算从90亿日元增至150亿日元，恐难实现盈利。^①

二是不利于技术进步。日本专利非公开制度将在2024年5月落地，范围或包括宇宙、网络、军民两用、高超声速武器推进等，须经内阁府二次审查。民间有反对意见认为，该制度存在“三难”现象——难预测将何种技术认定为不可公开、难准确测算专利收入减少情况、政府补偿难以弥补专利损失，进而影响企业和研究人员积极性。“当企业认为技术研发投资成本难以收回时，将停止研发脚步”。^②此外，还会产生“侵犯研究自由”“阻碍研究交流”等副作用，最终会迟滞日本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导致技术倒退。

三是背离吸引外资的政策。国内市场封闭，加之外国投资偏低，不利于提振经济、促进就业。为此，日本制定了《对日直接投资促进战略》，计划2030

① 日本经济新闻、「脱中国、物流や専門人材に懸念 製造原価5.3兆円増も」、<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2419Y0U2A121C2000000/>；日本经济新闻、「医療手袋、国内生産にコストの壁」、<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68929510S3A300C2LKA000/>。

② 日本经济新闻、「軍事転用阻止へ特許制限 損失の補償はあいまい」、<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39TO0T01C22A0000000/>。

年实现 80 万亿日元对日直接投资存量，同步引进外国人才与技术。^①但《外汇法》的理念与之背道而驰，过于注重“防范外部威胁”。其将网络、药品等资本偏爱的前沿领域纳入监管，需接受审查企业增加 40%，事实上强化了对日投资限制，造成与“吸引外资→促进公司治理改革→提高生产率”理念相悖的恶劣印象。《日本经济新闻》批评道，“小国”日本采取防守政策有极限，需在发展问题上更积极开放，推进彻彻底底的规制改革，吸引全球人财物和技术，避免“被大国（美国）玩弄于股掌之间”。^②

（二）扰乱地区繁荣稳定，破坏经济合作基础

日本在“印太地区”具备竞争优势，这是其实现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其随美重构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使地区局势陷入紧张，与“自由贸易旗手”形象不符，也动摇了发展基础。

一是引发地缘政治经济焦虑。岸田政府加入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推动 IPEF 等涉及产业链供应链、网络、绿色产业等，目的是“构建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形成对华东西包围态势，施加地缘政治经济压力”。^③日美过分强调绝对安全，将使地区局势陷入“胆小鬼博弈”困境，导致地区经济断裂，最终可能引发战争，不利于地区繁荣稳定。具体看，东盟是拉拢重点。日美希望东盟“志同道合”，共同制衡中国。这与“东盟印太展望”包容、对话、合作理念不符，造成东盟国家战略焦虑，认为“地区合作仅限于‘志同道合’国家，将缩小东盟战略空间，阻塞交流渠道，加深地区分歧”。^④东盟国家对“志同道合”态度慎重，不希不愿与中国对立。此外，印度即便参与

① 経済産業省、「対内直接投資促進に係る施策情報」、https://www.meti.go.jp/policy/investment/5references/siry0_06.html。

② 日本経済新聞、「『守り』に傾く日本の経済安保 問われる外資呼び込み」、<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13E70R00C21A9000000/>。

③ 小島真、「インド太平洋時代におけるインド経済拡大の展望」、『世界経済評論』、2022年5月6日号、第6-16頁。

④ 若松勇、「FOIPへのコミットを一段と高める」、『世界経済評論』、2021年11月12日号、第27-35頁；EAST ASIA FORUM, “The Quad and ASEAN — where to next?”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6/25/the-quad-and-asean-where-to-next/>。

QUAD，实际上还是愿与中国和平共存；韩国被日美拉拢加强 IPEF 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但仍与日美有温差。

二是迟滞东亚一体化进程。历经 40 多年发展，日本与东亚各国形成了紧密的东亚生产网络，对东亚出口增幅是对世界的 1.75 倍。^①虽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使东亚一体化目标更近一步，但日本正在迟滞这一目标。东亚一体化的基础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地区和平稳定，IPEF 等强调“人权”“技术保护”“数据自由流动”之类限制性规则，地区国家被迫“脱钩断链”的风险越来越高，不仅会增加地区生产成本、降低地区生产效率，进而破坏地区经济活力，日本也会遭受反噬的负面影响。例如，IPEF 将使日本对华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塑料、蓄电池、药品出口分别损失 1036 亿日元、2049 亿日元、1967 亿日元、162 亿日元和 146 亿日元。^②因此，有经济学者称，不应“煽动不良情绪，采取过度‘脱钩’政策”。^③

（三）必须回归真正的自由开放

保守主义实现不了“大国化”。安倍前后提出的“两洋交汇”“印太战略”的核心都是自由开放，但日本却没有真正践行。自由开放能提升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和居民福利，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达 32.7%。所以，日本必须跳出“小安全”格局，真正做到“开放且包容”，“不排除特定国家”。^④

日本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获益。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日本 2022 年收入 17.8 万亿日元，是 2012 年的 1.3 倍；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常收支中的占比，2013—2022 年平均 138.8%，是 2003—2012 年平均值的 2.6 倍。^⑤亚洲是其最主要收

① 浦田秀次郎、「日本経済の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世界経済評論』、2021年7月8月号、第30-39頁；RIETI-TID2020, <https://www.rieti.go.jp/projects/rieti-tid/>。

② 「インド太平洋経済枠組み（IPEF）が日本にもたらすインパクト」、『大和総研調査季報』、2022年秋季号（Vol.48）、https://www.dir.co.jp/report/research/economics/japan/20221020_030114.html。

③ 木村福成、「経済安全保障と対ASEAN経済外交」、『世界経済評論』、2023年1月2日号、第23-32頁。

④ 外務省、「『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た日本の取組」、<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056238.pdf>。

⑤ 財務省、「国際収支総括表」、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bpnet.htm。

入来源。服务贸易方面,2020年收入1618.4亿美元,是2000年的2.3倍。^①其中,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旅游净收入最高,为2.7万亿日元,是2015年的2.5倍。2022年知识产权贸易净收入2.5万亿日元,是2002年的16.7倍;文化娱乐贸易净收入701亿日元,2019年扭负为正。^②未来,日本还将受益于RCEP。RCEP解决了中日韩没有自贸协定的难题,最终生效后对华对韩出口的免税品种占比,将从8%和19%增至86%和99%。^③其中,对华出口,RCEP生效10年后关税削减36.7亿美元;对华进口,21年后削减24.1亿美元。^④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IPEF真正开放,促发展效果会更好。

中日是东亚生产网络两大支柱,中国市场对日本至关重要。2022年中日贸易额为3354.2亿美元,是1978年的50.8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量16.9万亿日元,占其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的26.1%。^⑤约3.3万家日企或日企办事处在华经营,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为15.7%,是对世界的2.1倍、对亚洲的1.4倍、对美国的3.0倍。^⑥中国有完整产业体系,在质量与规模、价格与时效上具有不可替代优势。谷内正太郎等认识到,日本必须正视中日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在自由开放理念下尽可能积极扩大合作领域,推动多层次交流和全球性议题合作,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避免“脱钩断链”引发日本经济混乱。回顾历史,2002年中国入世后,中日政治关系龃龉不断,造成“中日经贸关系失去的20年”。^⑦2002—2022年,中国GDP增长894.4%,日本对华出口仅增345.1%,远低于于欧盟(740.4%)、韩国(698.8%)和美国(652.4%)同期

① 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世界各国のサービス貿易収支」、<https://iti.or.jp/stat/3-010-1.pdf>。

② 財務省、「国際収支の推移」、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bpnet.htm。

③ 徐遵慈、「日中韓の経済統合に与えるRCEPの影響及び効果にかかる検証」、『問題と研究』、2021年12月号、第29-53頁。

④ 高橋俊樹、「RCEPの効果を最大にするにはどうすればよいか」、『国際貿易と投資』、2022年Vol.128、第86-10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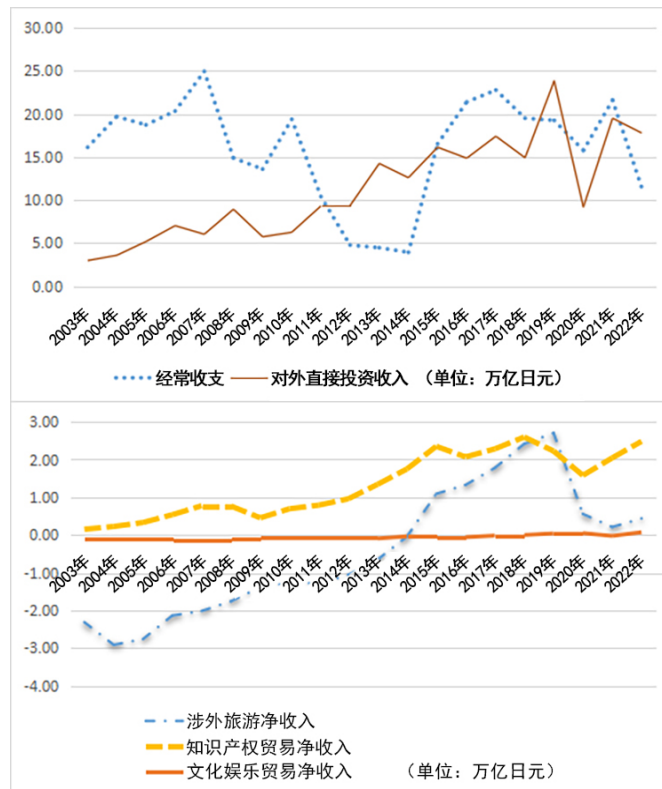
⑤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ドル建て貿易概況」、<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trade.html>; 財務省、「直接投資・証券投資等残高(地域別)」、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iip/data/index.htm。

⑥ 涌井秀行、松野周治、坂本雅子、「東アジア経済と日本」、『経済』、2022年9月号、第16-49頁。

⑦ 观点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在“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22年年会暨中日经济交流5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对华出口增幅。^①

图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收入等变动趋势图（2003—2022年）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国际收支总括表》与《国际收支推移表》，https://www.mof.go.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bpnet.htm。

离开中国市场，日本半导体产业面临技术与市场“双输”。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半导体及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2022年对华出口26.6万亿日元，占比达27.3%。^②日本在半导体领域随美乱舞，冒着“丧失经济合理性风险”限制中

① 中经数据，<https://ceidata.cei.cn/jsps/Default>；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22年统计月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gk/2799825/302274/302277/4185050/index.ht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http://www.stats.gov.cn/english/statisticaldata/yearlydata/yarbook2003_e.pdf。

② 財務省、「輸出入額の推移（地域（国）別・主要商品別）」，<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ui/html/time.htm>。

国，也无法达到阻止中国技术升级的目标。伴随中国自主研发加速，日本不但出口管制效果大打折扣，还会丧失产业链供应链关键优势。其更合理的做法是“加强技术研发→生产更多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增加中国对日依赖”，进而占据产业链供应链支配权。^①2023年3月，日本将极紫外光刻、刻蚀等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纳入出口管制，将对其产业发展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四）安全发展离不开亚洲与东方

东升西降与亚洲世纪是历史性大趋势，“西方的国际优势正在丧失，影响力正在下降……亚洲不仅富有生机，还具有竞争力”^②，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蕴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2000—2022年，亚洲经济圈的全球比重由26.8%升至33.1%，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地区（50.3%），中国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③反观美国，内外皆乱象，政治经济牵引力持续下降。作为亚洲与东方的一员，日本深悉亚洲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面对东升西降时理应用比美国更灵活。有日本学者呼吁，日本应与亚洲国家建立“和平的共生”关系，特别是与中韩建立共通的“东亚价值观”，构建“21世纪的日本战略力量”。^④

日美同盟式微是必然趋势。有学者认为，日美同盟是落后的、危险的，美国“不是简单地守护日本，而是基于美国利益为日本提供安全协助……若无好处，将立即远离，不再提供安全保障”。^⑤已有学者认识到，美西方“价值观”不再是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共同价值，强化同盟“对日本而言实际造成了

① 鈴木一人、「経済安全保障における重要技術の課題」、『経団連』、2022年12月号、第28-29頁；猪俣哲史、「米中対立下の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リスク」、『voice』、2022年3月号、第106-113頁。

② 孫崎亨、「これから世界はどうなるか——米国衰退と日本」、筑摩書房、2009年、第56頁。

③ 財務省、「輸出入額の推移（地域（国）別・主要商品別）」、<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uii/html/time.htm>；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

④ 進藤榮一、「日本の戦略力——同盟の流儀とは何か」、筑摩書房、2022年、第26-32、321頁；久田和孝、「日中韓とアジア的価値の幻想」、http://asia.kanagawa-u.ac.jp/pdf/asia-review/vol01/editorial_notes.pdf。

⑤ ケント・ギルバート、「強い日本が平和をもたらす日米同盟の真実」、ワニブックス、2021年、第5頁。

新的危险”。^①日本需反思日美关系，从守护国民而不是守护同盟角度审视安全发展，在同盟外积极开展“宽松的多边主义”外交，探索摆脱日美同盟的新路径。这对致力于发展经济的日本而言有巨大意义。^②有评论认为，日本与澳英菲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实质是为了减少对美依赖、加强自身战略地位，未来还需基于现实利益促进更多国家参与。^③

当前的日本“我执”于西方，忽视了亚洲与东方“为益之尤、为利之大”。日本在政治层面“入亚”始终落后，对中国在亚洲扩大影响力态度消极，是“有害的，甚至违背历史潮流的”。^④其有不少“开始就注定失败的例子”，如100多年前“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⑤明治维新已过150余年，日本应从“脱亚入欧”时代走向“脱美入亚”乃至“联亚联欧”时代，立足现实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⑥

余论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内外交困、底气不足，安全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交错叠加，国际地位有顺坡而下之势。日本在全球寻求三大权力、平衡三个偏好，

- ① 山根隆史、「増大する日米軍事同盟の危険性（下）」、『前衛』、2021年6月号、第13-29頁；薬師寺克行、「緩やかな多国間主義の時代」、『外交』、2022年7-8月号、第56-61頁。
- ② 白井聡、進藤榮一、『日米基軸幻想——凋落する米国、追従する日本の未来』、詩想社、2018年、第54頁；薬師寺克行、「緩やかな多国間主義の時代」、『外交』、2022年7-8月号、第56-61頁；朝日新聞、「(社説)『国を守る』を考える『国民第一』に総合力を磨け」、<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DA3S15483133.html>；山本義彦、「日米安保と日米経済戦後史と展望」、『経済』、2020年11月号、第36-53頁。
- ③ 薬師寺克行、「緩やかな多国間主義の時代」、『外交』、2022年7-8月号、第56-61頁；Richard J. Samuels、「安倍氏なき日本、重要性増す米中とのバランス」、<https://jp.wsj.com/articles/after-abe-japan-tries-to-balance-ties-to-the-u-s-and-china-11659311770>。
- ④ 白井聡、進藤榮一、『日米基軸幻想——凋落する米国、追従する日本の未来』、詩想社、2018年、第54頁；片田さおり、『日本の地経学戦略 アジア太平洋の新たな政治経済力学』、日本経済新聞出版、2022年、第18頁。
- ⑤ [美]约翰·W.道尔著，胡博译：《拥抱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序言第1页。
- ⑥ 進藤榮一、『日本の戦略力——同盟の流儀とは何か』、筑摩書房、2022年、第321頁。

战略性贴紧美国，显著活跃于国际舞台，意图在动荡世界中锚定自身方位。其最低需求是不被中美战略竞争甩出发展主航道，最高目标是弄潮百年变局实现“大国化”历史夙愿。

纵观历史，全球性动乱的根源都是霸权衰退。美国“困兽犹斗”，日本“战术投机”，看似风高浪大、水湍流急，实则竹影扫阶、月轮穿沼。美西方应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种种政策，最终将演化为新危机的源点。可以说，霸权地带正成为世界动荡的溯源地。过度追求保守价值观，过度关注战略自主和不可或缺，过度偏好“小安全”格局，日本与美国一道，越强调安全越不安全，越“脱钩断链”越没有发展，反而破坏了自身、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繁荣稳定。这一现象，可借用著名交通网络理论“布雷斯悖论”来作解答。“布雷斯悖论”由德国数学家迪特里希·布雷斯于1968年提出，指交通网络新增路线反会增加拥堵，降低整个交通网络的服务水平。原因是，个体效用函数最优选择不是集体效用函数最优选择，纳什均衡不一定是集体理性。鉴此，日本与美国的保守主义合流，造成全球安全发展的“布雷斯悖论”现象，不但不会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有悖于实现全球最优发展。当前的日本，从“身段柔软”角度讲，可谓安倍之后再无安倍。

世界正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格局拆解重组“才露尖尖角”。中日间的安全发展问题，有“两个变”和“三个不变”。变的是中日力量差距将有多大，以及日本如何抉择自身的国际秩序定位；不变的是拥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的近邻关系，同为亚洲与东方国家的文明共性，以及要共同面对“所在地区繁荣稳定的外来搅局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是多个力量互动的结果，“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①各国如何抉择，将决定其未来百年的前途和命运。中日同处东亚生产网络，共同构成地区产业链供应链；日本的安全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和技术，与中国加深合作是实现产业性权力、资源性权力和规则性权力的重要前提。

^① 《习近平：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人民日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525350557136457&wfr=spider&for=pc>。

未来30年是国际战略格局加速东升西降并产生决定性结果的重要历史阶段，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只有深刻认识全球安全发展问题的“大规律”与“小切口”，抓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这一根本性命题，顺应百年变局下保守与开放的矛盾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安全发展。合乎秩序的日本，还是合乎日本的秩序？这是摆在日本面前的一道重要思考题。

（责任编辑：黄丽梅）